

李运富 林定川

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二十世纪 汉语修辞学综观

李运富 编著
林定川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十月

二十世纪汉语学术史

作 者：李运富 林定川
出 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社 址：香港南丫岛宝华园85号A座二层
通 讯：香港南丫邮政局21信箱
发 行：香港青文书屋
印 刷：新世纪印务公司
版 次：一九九二年十月初版
定 价：人民币柒元
书 号：ISBN: 962-479-091-2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综述性的学术史，全面评介了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研究的成果，并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指明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全书三十五万余字，共分十章。除第一章绪论外，第二、第三章是以时间为线索的总体概述，第四至第八章是以内容为线索的专题分述，第九、第十章则是对整个汉语修辞学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课题前景等作综合性的评论。有纵有横，有详有略，有总有分，便于读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和把握；资料全面，信息丰富，内容实用，能为读者提供线索，节省查询时间；史论一体，评述结合，褒贬适中，可在学术上作读者进一步研究汉语修辞学的参考。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 | | | |
|-----------------|-------|-------|
| 第一节 现代修辞学与古代修辞学 | | (001) |
| 第二节 修辞学史研究概况 | | (005) |
| 第三节 本书的编写 | | (016) |

第二章 现代修辞学的建立

- | | | |
|------------------|-------|-------|
| 第一节 新派修辞学论著评述 | | (022) |
| 第二节 旧派修辞学论著评述 | | (030) |
| 第三节 兼摄新旧的修辞学论著评述 | | (036) |

第三章 现代修辞学的发展

- | | | |
|-----------------|-------|-------|
| 第一节 初步繁荣阶段 | | (043) |
| 第二节 “W”字线的第一个低谷 | | (049) |
| 第三节 普及与提高相结合阶段 | | (051) |
| 第四节 “W”字线的第二个低谷 | | (057) |
| 第五节 再度繁荣阶段 | | (058) |

第四章 修辞学理论研究

- | | | |
|------------------|-------|-------|
| 第一节 修辞、修辞学的性质和定义 | | (069) |
| 第二节 修辞学的对象和范围 | | (081) |

第三节	修辞的目的和原则以及修辞学的功用和任务	………	(096)
第四节	修辞的内容与形式及修辞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	(110)

第五章 一般修辞现象研究

第一节	修辞现象的理论性研究	………	(118)
第二节	字词句修辞研究	………	(135)
第三节	消极修辞及文字标点修辞研究	………	(149)
第四节	篇章段落修辞研究	………	(159)
第五节	修辞史与非语言因素修辞及其他	………	(168)

第六章 修辞格研究

第一节	辞格基本理论的研究	………	(186)
第二节	辞格系统的整体分类	………	(206)
第三节	汉语辞格的数目及起整理	………	(223)
第四节	具体辞格研究举例(比喻)	………	(235)
第五节	具体辞格研究举例(通感及其他)	………	(255)

第七章 修辞风格研究

第一节	文体现风格研究	………	(271)
第二节	语体现风格研究	………	(280)
第三节	语言风格研究	………	(299)
第四节	文艺修辞研究	………	(311)

第八章 修辞学分科研究

第一节	修辞学体系与分支(边缘)学科	………	(326)
第二节	语法修辞学研究	………	(329)
第三节	比较修辞学研究	………	(340)

第四节	同义修辞学研究	(347)
第五节	言语交际和公关修辞学研究	(361)
第六节	信息修辞学和模糊修辞学研究	(370)
第七节	逻辑修辞学和文化修辞学研究	(379)
第八节	辞章学及其它专科性修辞研究	(389)

第九章 修辞研究法与修辞学方法论

第一节	传统研究方法的反思	(397)
第二节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方法论	(408)
第三节	修辞学现代化与自身方法论	(417)
第四节	修辞学史论与批评论	(424)

第十章 现状分析与课题方向

第一节	修辞学研究现状分析	(430)
第二节	尚需努力的主要课题	(435)
第三节	修辞学发展趋势预测	(443)

后记 (447)

第一章 絮 论

第一节 现代修辞学与古代修辞学

现代与古代，大致以本世纪初为界。

我国古代修辞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一些关于修辞的论述。例如《易经》的“立诚”论、《礼记》的“辞巧”观、《论语》的“辞达”和“正名”说，都对后世影响深远。^①

到了汉代，修辞的研究有了发展，出现了比较详细的专题论述，提出了比以前更多的修辞观点，例如王充《论衡》中的“超奇”、“语增”、“艺增”、“儒增”各篇就多涉修辞，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1)主张“外内表里，自相副称”；(2)反对“美盛之语”、“虚妄之言”；(3)提倡“明言”、“露文”、“言文合一”。^②

魏晋南北朝后，修辞学研究的范围更加广阔。例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和刘勰《文心雕龙》等都具体论述到语言风格及文体等。特别是刘勰《文心雕龙》的问世，被认为“奠定了古代修辞学的基础”，因为它“论述了修辞的原则、修辞手法、字句篇章修辞、修辞的音乐美、修辞的鉴赏、文体风格与作品风格等许多方面。修辞思想之丰富，修辞范围之广阔，修辞观点之精当，都是空前的”。^③

隋唐五代时期，虽有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文论修辞，白居易、杜甫、司空图等人的诗论修辞，而更具影响力的是刘知几的史论修辞，他在《史通》这部杰出的史学理论著作中，对史体的修辞原则、史体的修辞手法、史体篇章修辞的要求，都作过很精辟的论述。

宋金元时期已经有了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修辞理论，陈骙的《文则》可以算作汉语修辞学的第一部专著。该书以总结作文的法则、规律为目的，通过对古代经籍修辞现象的研究分析，概括出多种修辞原则和理论，归纳的修辞现象涉及面很广，包括后世的消极修辞、积极修辞、文体风格等多方面，而且能自觉地运用比较和归纳法，所以它被公认为我国修辞学史上的第一本比较有系统的“专著”。^④

明清时期，我国古代修辞学得以全面发展。除继承原有的文论、诗论、史论等修辞理论以外，还提出并阐述了戏曲以至小说修辞等方面的理论，如王骥德《曲律》、《李笠翁曲话》、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等，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清代出现了许多不同流派的修辞观，宋濂、李梦阳、方苞、姚鼐、章学诚、顾炎武、俞樾、龚自珍、黄遵宪、王夫之等都有关于修辞方面的叙述，或同或异，互相发明，极大地丰富了古代修辞学理论宝库。

古代修辞学源远流长，深受古代文化的影响，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对此，不少学者作过探讨，如濮侃、蔚群曾发表《试论我国古代修辞研究的特点》^⑤，提出这样一些看法：(1)我国古代修辞理论出现甚早，但系统的修辞专著则出现较晚；(2)古代修辞理论常与文论、诗论、史论、风格甚至文字训诂混杂一起；(3)概念混乱、界限不清的现象相当普遍，有些论著甚至带有某种神秘色彩；(4)重内容、轻形式，重文字、轻口语。戴婉莹的《中国古代修辞学的几个问题》^⑥也认为，“我国古代修辞学主要有

三个特点”：(1)文章学与修辞学相互包容与结合；(2)经验性与概括性相互渗透与并存；(3)流派性与多样性互相促进与发展。这些看法基本上符合古代修辞学的实际。

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标志着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始，在这种新的学术规范的影响下，古代修辞学也逐渐为现代修辞学所取代。

古代修辞学向现代修辞学的过渡，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一是从传统的语文研究中逐渐剔除非修辞的内容，相应地加强语言运用规律的总结，从而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专科修辞学。这就是所谓的“旧派修辞学”，可以郑奠《中国修辞学研究法》、杨树达《中国修辞学》为代表。杨著是在替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作《续补》的基础上写成的，他的《自序》说：“余因念俞君书本兼说修辞校勘二事，欲使扩充，令各成专科之学”。可见他有明确的修辞学指导思想，是自觉地想用现代科学的规范来建立一个古汉语修辞学的体系的。

第二条途径是直接从外国借用一个或综合几个修辞学体系和框架，然后从汉语中寻找一些合适的实例填充进去，并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增删调整，从而形成现代气息较浓的汉语修辞专门学科。例如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唐钺的《修辞格》、王易的《修辞学》、张弓的《中国修辞学》等，都可以作为代表，这就是所谓的“新派修辞学”。

第三条途径是以已经产生的某种现代学科为具体规范，将传统的修辞研究杂入其中，从而形成修辞学被包容在其他某门学科中的学科样式。这可以龙伯纯《文字发凡·修辞卷》、王梦曾《中华中学文法要略·修辞编》为代表。这种范式的修辞学，虽然独立性较差，但体系上仍然属于新派，而且可以看作后世边缘修辞学(例如语法修辞学或修辞语法学)产生的渊源。

总之，旧派大多是对古代修辞学作些归纳总结和集录演绎，

新派则主要借鉴西方或日本的研究模式。但旧派并不是一概不涉新法，而新派也不是毫不顾及传统。事实上，旧派在用语、格式、演绎方面，由于受新思潮新科学的影响，常常会运用新术语新体制，而新派要开创独立的中国修辞学，完全抛弃古人的研究成果和汉语的修辞实际也是不行的。因此，现代修辞学的建立，既不是旧学的简单继承，也不是西学的完全照搬，而应该是旧学与今学、汉学与西学的完美结合。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就代表着当时这种结合的最高成就，因而也是现代修辞学正式建立的公认的标志。《发凡》之后，现代修辞学就大致朝着两大方向发展：一是专题或分支的深入；二是边缘或综合的拓宽。

现代修辞学固然与古代修辞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作为两种不同的学术规范，它象古代修辞学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样，也表现出自身独有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

(1) 现代修辞学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再跟文论、诗论、史论、文字训诂等内容混杂一起。虽然创始之初仍有被文学、美学、作文法、语法等包容的现象，但很快就被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专门学科。

(2) 现代修辞学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基本态式，对修辞的目的、原则、效果和手段，修辞现象的性质和分类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都有明确的认识，从而规定了本学科的基本范围。

(3) 现代修辞学能自觉地运用先进而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比较法、演绎法、分析法、综合法、计量法、公式法以及辩证观与系统论等等。在科学方法的支配下，现代修辞学正向公理化和科学化的方向迈进。

(4) 现代修辞学具有明确的“学”的观念，在客体研究的同时，注意了主体的研究，即“修辞学”的研究，例如对学科体系的建设、汉语修辞学史、修辞学研究方法及方法论等有比较浓厚的兴趣。

(5) 现代修辞学的研究还有鲜明的时代风貌，例如有学术组织、有学术刊物、有大型学术会议、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信息资料交流迅速等等。这些都是古代修辞学难以想见的。

【本节附注】

- ① 参李金苓《春秋战国修辞理论散论》，《语文研究》1983.3。
- ② 参李金苓《王充的修辞理论》，《修辞学研究》第1辑，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
- ③ 易蒲、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页122。
- ④ 参谭全基《（文则）研究》，香港，1978。
- ⑤ 载《修辞学研究》第2辑，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 ⑥ 载《齐鲁学刊》，1985年第4期。

第二节 修辞学史研究概况

既有修辞学，自然就有修辞学史。但我国修辞学的发源较早，据郑子瑜研究，甲骨金文中就有谈论修辞的记载了^①，而修辞学史的研究却起步较晚。严格说来，汉语修辞学史的研究是现代修辞学建立以后的事情。

最早从“史”的角度来研究修辞学的是胡光炜，他曾写过《中国修辞学史略》和《中国修辞学史》两篇文章，分别载于《国学丛刊》第一卷第一期(1923) 和第二卷第一期(1924)，可惜并没有写完。此后，张弓在《中国修辞学》(1926)“总说”部分、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1932)“结语”部分，也论述了修辞学的发展史。再后，一些修辞学专著中列出了以“修辞学史”为题的专章专节，如徐梗生《修辞学教程》(1933)、章衣萍《修辞学讲话》(1934)、陈介白《新著修辞学》(1936)等。直到1965年，才出版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修辞学史专著——

郑子瑜《中国修辞学的变迁》。

从单篇论文到引入专著，再到在专著中占专章专节的位置，直至诞生专著，这反映了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探索之路。因此，我们把1965年以前的修辞学史研究看作探索时期。探索时期的研究有三个特点：

(1)修辞学史与修辞史还分不太清，常常混而言之。如胡光炜《中国修辞学史》论述了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修辞学研究概貌。他将中国修辞学史分为三个时期：春秋为“言语文章并重”时期，战国是“言语修辞最盛”时期，汉以后至现代是“偏尚文章修辞”时期。显然，这里的分期标准是修辞在言语和文章中的运用比重，是修辞的特点而不是修辞学说的特点，因此，这只能是“修辞史”的分期，而不是“修辞学史”的分期。但实际上，他又论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如墨、法、儒、道家等)的不同修辞观，确有修辞学的内容。可见在他头脑中，“修辞史”与“修辞学史”是模糊不分的。张弓《中国修辞学》论及“中国修辞的进化观”，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为“辩说期”，特点是“言语修辞”特盛，目的为劝说、论证，材料以口述为主；汉以后为“词章期”，特点是“文章修辞”特盛，目的转向鉴赏方面，材料则以诗、文为主。并推断今后的汉语修辞一定是口语、书面语并重。这是立足于“修辞史”来说的，但其中也有“修辞学”的内容(比如“鉴赏”问题)，而且还开列了我国古代论及修辞的书籍三十几本，这又确实在谈修辞学史了。

(2)模仿外国修辞学史的框架，并结合评介外国的修辞学史内容。如胡光炜的第一篇论文《中国修辞学史》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释名”，二是“述西洋修辞学之变迁”，三是中国修辞学以及中外修辞学特点的简单比较。又如徐梗生《修辞学教程》第六篇，论述“西洋修辞学演变之史实”与“东洋修辞学演变之史实”，而中国修辞学史只是“东洋”中的一部分。其他如

章衣萍、陈介白等也是将中国修辞学史与欧洲或西洋、日本修辞学史并列着论述的。欲论中国修辞学史，却夹带外国修辞学史甚或以外国修辞学史为主，这恐怕是探索过程中的一种尝试，或者说不得已吧。

(3) 内容简要，初具规模。这时的修辞学史虽有明确分期，但一般篇幅不长、论述较简。如陈望道把修辞学史分为三个段：第一是萌芽时期，指古代至19世纪末；第二是修辞文法混淆时期，指《马氏文通》以后至“五四”运动；第三是中外修辞学说竞争时期，指1919年至1932年。陈氏简要分析了每个时期的特点，全部论述只是《发凡》“结语”中的一部分。即如郑子瑜的专著《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也不过二万四千多字，加上收入的另外五篇修辞学论文才五万字。该书由日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出版，正文分九节，分别论述了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隋代、唐宋、金元明、清代以及现代的修辞学。论述中突出了不同历史时期修辞研究的主要特征，系统性较强。但终嫌简略，难以深入展开。

1965年以后，汉语修辞学史的研究逐渐走向成熟。郑奠、谭全基《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为修辞学史研究的成熟提供了集中、全面的资料，而郑子瑜的《中国修辞学史稿》(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则是成熟的标志。其后，易浦、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1989吉林教育出版社)，宗廷虎《中国现代修辞学史》(1990浙江教育出版社)，袁晖、宗廷虎等人的《汉语修辞学史》(1990安徽教育出版社)相继出版，更是成熟的产物。

郑子瑜的《史稿》是在他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基础上扩充而成。全书42万多字，分十篇。除首篇“绪论”和末篇“结论”外，中间八篇根据中国各朝代修辞思想发展的特点，将修辞学史分为八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先秦，是修辞思想的萌芽

期；第二个时期——两汉，是修辞思想的成熟期；第三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是修辞学的发展期；第四个时期——隋唐五代，是修辞学发展的延续期；第五个时期——宋金元，是修辞学发展的再延续期；第六个时期——明代，是修辞学的复古期（上）；第七个时期——清代，是修辞学的复古期（下）；第八个时期——现代，是修辞学的革新期。”（见该书《绪论》）涉及材料的下限为1979年。

易蒲、李金苓的《史纲》共二十九万字，也分十章。它“根据古今修辞理论发展的轨迹，分段论述了每个时期的演变特征，把汉语修辞学史的发展大别为古代和现代两个阶段。古代阶段分为四个时期：修辞学的萌芽时期（上、下）——先秦、两汉；修辞学的奠定基础时期（上、下）——魏晋南北朝、隋唐；修辞学的初步建立时期——宋金元；修辞学的发展时期（上、下）——明清。现代阶段分为两个时期：现代修辞学的系统建立时期——20世纪上半叶；现代修辞学的普及和深入时期——新中国建立后至1966年前。”（见该书《绪论》）

宗廷虎的《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是一部断代修辞学史，时限为1905年至1988年。该书共七章，约三十四万字。它根据时代的发展，把现代修辞学大别为新中国建立前和建立后两个历史阶段。新中国建立前为“20世纪上半叶的修辞学”，即本书的上编。分三个时期：现代修辞学的萌芽时期（1905—1918）、现代修辞学的逐步建立时期（1919—1932）、现代修辞学的发展时期（1933—1948）。新中国成立后为“建国以来的修辞学”，即本书的下编。也分三个时期：白话修辞学的创立与发展时期（1949—1965）、大陆修辞学的“沉寂期”和港台修辞学的发展期（1966—1976）、现代修辞学开始走向繁荣时期（1977—1988）。

袁晖、宗廷虎主编的《汉语修辞学史》，凡四十一万字。该

书把二十世纪以前的汉语修辞研究称为“汉语古代修辞学”，二十世纪以来的汉语修辞研究称为“汉语现代修辞学”。前者分为七个时期，即“萌芽期”（先秦）、“成长期”（两汉）、“初步建立期”（魏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成熟期”（宋金元）、“纷争期”（明代）、“丰收期”（清代）。后者分为两个时期，即“现代”（二十世纪前五十年）和“当代”（建国后的四十年）。

之所以说这几部专著是成熟的修辞学史，因为它们具有这样几个特点：(1)有独立完整的体系，内容涉及修辞学的各个方面；(2)材料翔实，论述具体深入；(3)有系统的修辞学史理论作指导，对研究修辞学史的目的和重要性、原则和方法、体系和分期等都有比较明确的认识。相对来说，《史稿》的最大成就在于它建立了第一个中国修辞学史体系；《史纲》的突出贡献在于它创造性地运用了系统论的方法和采用了以特定的项目为纲目的新路子；《中国现代修辞学史》的真正价值在于展示和评论了前两本书只略有提及的现、当代修辞研究的最新成果；而《汉语修辞学史》则将古今融贯到底，堪称比较完备的“通史”。

成熟期的修辞学史研究，也有一些表现为专篇论文或修辞学著作中的专章。例如唐启运《汉语修辞学的过去和现在》（华南师院学报81.2）、罗淑芳《汉语修辞研究史小引》（河北大学学报85.1）、杨鸿儒《中国修辞史略》（成都大学学报90.1）^②；又如周秉钧《古汉语纲要·修辞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中有《汉语修辞研究简史》，电大教材《现代汉语》（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下册刊有周振甫《中国修辞学简史》，李维琦《修辞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里有《古汉语修辞学简史》，黎运汉、张维耿《现代汉语修辞学》（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7）有第二章《中国古代修辞理论》及第三章《汉语修辞学的建立和发展》，宗廷虎《修辞新说》（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的第五章为

《汉语修辞学史概说》等，它们都以相当的篇幅全面而简略地论述了数千年来汉语修辞学的发展历程。

如果说从总体上通论汉语修辞学史的专著、专章或专文还屈指可数的话，那么涉及修辞学史个别问题或片断时期的论著就简直难以作出精确的统计了。这些论著大致可分为几种类型：

(1) 对修辞学论著的评介。

修辞学论著是一定时期内修辞学术成果的具体表现形式。介绍这些成果的内容，评论其得失，正确估价它们在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这是修辞学史的当然责任。因而书评、文评本身也就是学术史研究的成果。就修辞学而言，目前的情况是书评很多而文评偏少。对解放后出版的每一种有关修辞的书几乎都有评介，或述其内容而推介于人，或论其得失而申明己见，或借题发挥由此及彼，或就事论事人云亦云，或序或跋，或信或文，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粗略统计，约二百余篇^①。还有不少文章评论了解放前的一批修辞学专著，涉及《汉文文言修辞学》（原名《中国修辞学》）、《修辞鉴衡》、《修辞格》、《作文修辞讲话》、《中国修辞学》（张弓）、《修辞学讲义》、《文字发凡·修辞卷》、《修辞学教科书》等数十种，而最多的是对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研究和评论。复旦大学曾编辑出版《〈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1983）一书，收入从各个角度评论《修辞学发凡》的文章48篇；《修辞学习》于1982年1至4期及1987年第6期设有纪念专栏，也发表有关《发凡》的书评类文章20余篇。

不唯本世纪的修辞学专书，对古代有关修辞学的其他著作，亦多所发掘，如《春秋繁露》、《续锦机》、《书序指南》、《文则》、《文心雕龙》，甚至《论语》、《墨子》、《论衡》等，都有文章从修辞学的角度加以评介。特别是《文心雕龙》和《文则》，它们标志着古代修辞学的建立和发展，研究的论著更多。台湾学者沈谦出版了《文心雕龙与现代修辞学》^②